

闽南人与中华文化在菲律宾的传播

李金明

福建与菲律宾，在地理上靠得比较近，从厦门到马尼拉的距离大约是 675 海里。来往于两地之间的帆船，直接受到澎湖沟海流的影响，每当航经澎湖时，“其海水号澎湖沟，其水分东西流，一过此沟，水即东流达于吕宋，吕宋回日过此沟，水即西流达于泉漳。”^①因此，在帆船时代，从福建港口到马尼拉的航程，大约仅需要 10~15 天。地理上的邻近与航行上的方便，使福建与菲律宾在历史与文化上都有过密切的联系，福建的文化传统在早期的菲律宾得到广泛的传播，每当人们谈到菲律宾的历史、风俗、传统和美德时，都必然会与福建人的广泛影响联系起来，这些影响如今仍可从菲律宾人的生活中得到证实。^②本文拟从贸易、移民的角度，对中华文化在菲律宾的传播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我国与菲律宾的文化接触，据说早在公元前 3000 年就已开始，当时的新石器文化从中国南部直接传到菲律宾沿海，菲律宾史前祖先使用的圆形或椭圆形石斧就是在这个时期引进的。菲律宾著名的考古学家拜也教授 (H. Otley Beyer) 是持这种观点的权威，他认为，公元前 1750 年之前使用的脊状石斧和公元前 1500 年使用的梯形石斧都是从中国南部传进来的。后来他从菲律宾的考古研究中又发现，可能有一个早期的移民浪潮从福建 (或者是中国中部沿海的其他地区) 经过巴塔内斯——巴布延群岛进入菲律宾北部，并分散到菲律宾东部，远至西里伯群岛。他提出：“这次移民是由所谓的‘葬民’ (Jar-Burial People) 发起的，他们大约从公元 3 世纪至 8 世纪似乎已经沿着东部沿海向南分布，这就是菲律宾人所说的‘原始铁器时期’ (Protohistoric Iron-Age)。这次移民的出现起源于福建省，它作为中国人南移的一部分而进入群岛，时间主要是发生在隋朝和唐初。”^③有趣的是，这种用大埋葬死人的习俗，在菲律宾的巴布延、巴塔内斯群岛、吕宋北部、塔亚巴斯南部、索索贡、萨马 (三描)、民都洛东部、卡拉棉和巴拉望的早期居民中都普遍存在。^④

尽管菲律宾考古学家把中菲文化接触的时间推到那么早，但是，我国史籍有关福建与菲律宾交往的最初记载却是在南宋宝庆元年 (1225 年)，当时任福建路市舶提举的赵汝适在其撰写的《诸蕃志》一书中，把菲律宾的民都洛岛称为“麻逸国”，把卡拉棉、巴拉望、布桑加岛称为“三屿”，并分别叙述了福建海商到那里贸易的情况。^⑤到元代至正九年 (1349 年)，江西南昌人汪大渊在其著作《岛夷志略》中记载了三岛土著附舶至泉州贸易的情况，他写道：“男子尝附舶至泉州经纪，罄其资囊，以文其身。既归其国，则国人以尊长之礼待之，延之上望，虽父老亦不得与争焉。习俗以其至唐，故贵之也。”^⑥这种贸易往来一直至 15 世纪中叶，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菲律宾之前仍在继续。据一位在 1521 年跟随麦哲伦到达菲律宾的幸存者安东尼奥·皮加费特拉 (Antonio Pigafetta) 说，每年大约有六至八艘中国船到达民都洛，在一些菲律宾头人的家里也看到瓷器和丝绸，多数可能是来自中国。^⑦马尼拉首

任总督利牙实比 (Miguel Lopez de Legazpi) 在 1567 年 7 月 23 日从宿雾致信西王腓立普亦谈到: “在我们住地的北部, 也许是西北部, 离不了多远, 有一些大岛屿, 称为吕宋和民都洛。中国人和日本人每年都到那里贸易, 他们带来的货物是丝绸、织物、钟、瓷器、香、锡、印花棉布和其他小东西, 载运回去的是黄金和蜡。这两个岛上的人是摩尔人 (摩尔人是伊斯兰部落, 他们来自南方, 其要塞在民都洛和苏禄群岛), 他们把中国人和日本人带来的货物购买下来, 然后转运到群岛各地贩卖。”^⑧

然而, 当时这种贸易仅是维持在零星、小规模的范围内进行, 只有到了 1571 年 5 月, 西班牙殖民者占领马尼拉之后才得以迅速、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促使如此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西班牙殖民者刚占领马尼拉后不久, 即发现菲律宾本地资源缺乏, 与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距离遥远, 既无胡椒, 又无香料, 人口稀少, 无法开矿或种植, 根本供应不了西班牙殖民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利牙实比对他发现的这块殖民地的工业前景感到很不满意, 马尼拉第三任总督桑德 (Francisco de Sande) 甚至称这块土地“贫瘠到一个人人都必须靠施舍过日子”。而利牙实比的商船船长卡里翁 (Juan Pablo Carrion) 却认为: “在这些岛上不可能有任何利益可想, 除了有可能打开与中国或其他岛屿的贸易联系。”^⑨ 他在民都洛外海营救了一艘沉没的中国帆船的水手, 并把他们送到安全地点, 这些水手回到中国后, 宣扬了西班牙人的好处, 使一些急于寻求贸易机会的中国商人来到菲律宾。他们载运来的生丝、瓷器不仅使中国与马尼拉贸易迈出了稳步发展的第一步, 而且打下了墨西哥大帆船贸易的坚实基础, 为几个殖民地国家确立了经济生活道路。奥古斯都历史学家朱尼加 (Padre Zuniga) 曾评论过: “在 1572 年初, 这些被西班牙人从民都洛海难中营救出来的中国人, 带着大量的珍贵商品来到这里, 随来的还有不少中国人, 由此建立了一种赢利贸易的基础。”^⑩ 西班牙殖民者就这样把希望寄托在与中国的贸易上, 藉此维持他们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他们开辟了从马尼拉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 把墨西哥银元载运来交换中国的货物; 他们采取各种笼络手段, 积极鼓励中国商船到马尼拉贸易。马尼拉第二任总督拉未沙礼示 (Guido de Lavezares) 在 1574 年 7 月 17 日致西王的信中就谈到: “尽管中国沿海大批海盗出没将使贸易造成损失, 但我们还是欢迎越来越多的福建商船到马尼拉贸易。”^⑪

另一方面是明朝政府在嘉靖倭患基本平定的前提下, 于隆庆元年 (1567) 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 准许私人申请文引出海贸易。当时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白银使用已相当普遍, 出现了银价上涨的趋势。与同时期的外国银价相比, 显然高出相当多, 就以 1560 年来说, 欧洲的金银比价是 1: 11, 墨西哥是 1: 13, 而中国仅为 1: 4。这就是说, 把当时的墨西哥银元运到中国来, 马上可提价 3 倍, 即比在西班牙或墨西哥多购买 3 倍的货物。^⑫ 正因为利藪所在, 故福建海外贸易商为墨西哥银元所引诱, 迫不及待地涌向马尼拉。当时的福建巡抚徐学聚就说过: “我贩吕宋, 直以有佛郎机银钱之故。”^⑬ 闽人何乔远也指出: “度闽海而南, 有吕宋国……多产金银, 行银如中国行钱。西洋诸国金银皆转载于此以通商, 故闽人多贾吕宋焉。”^⑭ 即使是西班牙殖民者本身, 亦很清楚这一点, 桑德在 1576 年 6 月 7 日曾致信教皇陛下说: “我只是相信, 中国人对我们的贸易感兴趣, 主要是因为墨西哥银元和当地的黄金。”^⑮ 福建海外贸易商就是利用两地之间的白银差价来赚取巨额利润, 他们即使把载运出去的货物卖得相当便宜, 换回来的银元仍然是有利可图, 如李廷机所说: “所通乃吕宋诸番, 每以贱恶什物, 贸其银钱, 满载而归, 往往致

富。”^⑩

当时到菲律宾贸易的福建帆船，绝大多数是从厦门出航，根据在 1596—1598 年任马尼拉总督的摩加（Antonio de Morga）描述：“他们虽然没有一起来，但是组成商船队或战船队。他们一般在新历三月乘着季候风和晴朗天气成群结队地到来，到马尼拉的航程是 15 或 20 天，售卖他们的货物，为了不使回程遇到危险，他们在五月底或六月初季候风改变前返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长约翰·萨雷斯（John Saris）亦写道：“开往马尼拉的帆船成群地从厦门出发，有时是 4 艘、5 艘、10 艘或更多在一起航行，好象是事先约好似的。”^⑪

（二）

当时随船到菲律宾贸易的福建海商，也大多数是厦门附近的闽南人，他们在菲律宾被称为“Sangley”或“厦郎”。“Sangley”一词是厦门方言“生理”的音译，意思是“贸易”^⑫，这是以他们的身份来命名；而“厦郎”一词则是说他们来自厦门，是以他们的籍贯来命名。^⑬有人曾对他们的人数作过如下估计：自 1571 年福建与马尼拉之间帆船贸易开始后的 30 年里，大约有 630 艘帆船从福建港口航行到马尼拉，每一艘船载运的人数约 300 人，包括水手、商人、观光者与乘客等，因此，在这 30 年里大约有 19—20 万人随贸易帆船到达菲律宾。当然，其中绝大多数在 4 个月后的下一次季风期即返航中国，但是也有不少人留了下来。^⑭这些留下来的商人，有的是因错过季候风，在那里“压冬”；有的是因经营不善破产不能归，而不得不在那里成为华侨。如顾炎武所说：“是时漳泉民贩吕宋者，或折关破产及犯压各境不得归，流寓土夷，筑庐舍，操贾杂作为生活，或娶妇长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⑮有关这些留下来的华人人数的估计，我们可以西班牙殖民者征收的贡税额为准。

1611 年，西班牙殖民者要求居住在菲律宾的非基督教华人，每人每年必须缴付 64 里亚尔（或 8 比索）的贡税，如贫穷者可以免缴。在 1615 年，西班牙殖民者共征收贡税 53832 比索；在 1635 年，共征收 116916 比索。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这 20 年居住在菲律宾的华人数已增加了一倍多，仅 1635 年就有 14614 名华人缴税，这些还没有包括免税者和偷漏税者。故蒙法尔科（Grau y Monfalcon）在 1636 年声称，居住在菲律宾的华人总数是 3 万人。^⑯

这些早期移居菲律宾的华人几乎都是来自厦门和泉州一带的福建人，广州人很少，他们要到 1800 年以后才有一小部分经澳门来到菲律宾，他们搭乘的是欧洲船，在马尼拉被称为“澳门人”（macaos）^⑰。为了了解这些福建人的地缘和族缘，我们不妨看看近代菲律宾政府对马尼拉、卡加延、怡朗和宿雾 4 个省的华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这 4 个省的华人有 80% 以上是来自闽南 4 个县：晋江、同安、南安和龙溪，余者少数是来自安溪县、惠安县、海澄县、兴化府、厦门厅和枫亭司。其中人数最多（超过 50%）的是晋江（包括泉州市），接下去是同安、龙溪（包括漳州市）和南安。如按姓氏来说，在人数上占优势的有 12 个姓：陈、黄、施、林、蔡、王、李、吴、许、杨、叶和郭，这些姓占了华人人口总数的 2/3；其中仅陈姓一姓就占了 10% 以上。占抽样人数一半的 7 个姓陈、施、蔡、王、李、许和吴，都是来自晋江县。^⑱

上述事例说明，早期移居菲律宾的闽南人，主要是对贸易感兴趣，他们不是传播什么新思想，也不想改变当地人的生活习惯。^⑲在与当地人的广泛接触中，他们很自然地把中华文化传播到菲律宾，影响到菲律宾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先从衣着服饰说起，早期他加禄人

穿的宽松衣服、摩洛哥妇女穿的带袖衬衫和宽松裤子，显然都是受闽南人的影响。在古代的比萨扬群岛和摩洛哥人中，对衣服的颜色限制也跟闽南人一样，黄色仅限于富人和贵族穿，平民穿兰色，葬礼时穿白色，直至西班牙人征服后，才以黑色为丧服^⑧。

在饮食方面，据说面包和烤面包技术是由闽南人引进菲律宾的，在菲律宾语中有关面包一类的词汇（如 tinapay 或 cognates thereof）都是源自于福建方言。萨拉查（Salazar）主教在 1590 年曾提到，华人面包师以从中国载运来的面粉制作面包，因为当时菲律宾很少种植小麦。^⑨有些闽南风味的小吃，如面线（misua）、润饼（lumpia）、烧包（siopao）、薄饼（hopia）等等，都是由闽南人传到菲律宾，深受菲律宾人的喜爱。时至今日，在菲律宾许多城市或城镇里，还有不少饭馆和小吃店是由华人掌管，如 50 年代时髦的马尼拉宾馆的“月亮门”（Moon Gate）和“扇子门”（Fan Gate），新建的菲律宾宾馆的“金莲花”（Golden Lotus），望海宾馆的“望海楼”（Bay View House）和许多马尼拉的其他宾馆，都是由华人在操作。在碧瑶、宿雾、伊洛伊洛（怡朗）、达澳（纳卯）、纳加、三宝颜、卡加延等地，也有许多类似的由华人掌管的小吃店^⑩。

在语言方面，福建方言对菲律宾国语——他加禄语的影响亦比较大。据菲律宾大学语言学家曼纽尔教授（E. Arsenio Manuel）说，在标准的他加禄语常用词汇中，大约有 2% 是源自于闽南方言。他在《他加禄语中的汉语成份》一书中列举了来源于汉语的他加禄词汇 381 个，不包括异体字、派生词和复合词，其中有关食物和烹饪的占 20%，如米（hibe）、米粉（bihon）、牛肚（goto）、茶（tsa）、芋（ukoy）等等；有关行为的占 16.3%，如宽松（lawlaw）、秘结（pikit）、啄啄（tuktok）等等；有关抽象思想或术语的占 10%，如柔软（lupaypay）、不散（pusyaw）、仇敌（suwitik）、同意（tangi）、妓女（kiri）等等；有关铁匠术语的占 9.2%，如锁匙（susi）、钳子（tioni）、金条（ginto）、挂钩（pakaw）、铜线（tanso）等等；有关家属关系术语的占 6%，如祖父（ingkong）、祖母（impo）、姐姐（ate）、二哥（diko）、三哥（sangko）、姑爷（kuya）等等；其余是有关农业、器械、工具、商业、工业和娱乐等方面的术语。^⑪

在陶瓷使用方面，早在西班牙殖民者占领马尼拉之前，福建海商就把大量的陶瓷运到菲律宾出售。这些陶瓷多数是实用的生活用品，如盘、碗、碟、茶壶之类，很少有类似瓷佛像、花瓶等装饰用的陈列品。^⑫据记载，在 1570 年 5 月 8 日，一些西班牙殖民者在从帕奈到马尼拉途中，经过民都洛岛时，发现那里有两艘中国船，即派索尔西多（Salcedo）前往侦察，并掠夺了船上的货物。后来索尔西多描述说：“两艘船的甲板上都堆满陶坛和瓷器，有大的瓷盆、盘和碗，还有一些细瓷坛。”^⑬由于这些陶瓷广泛地分布于菲律宾各地，对菲律宾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大意义，故拜也教授把西班牙占领前的菲律宾历史分为“前瓷器时期”（公元 300—850 年）和“瓷器时期”（9—16 世纪）。^⑭这些陶瓷在菲律宾普遍被人们用来作为衡量财富、社会地位和夸耀的本钱，据说在三宝颜半岛的苏巴农斯人（Subanuns）和阿布拉的廷吉安斯人（Tinguians）更是如此，有些想提高社会地位和影响的家庭就想设法攫取和增加自己的陶瓷收藏，特别是大坛，平时被放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以让来访者观看，庆典时习惯于用来装葡萄酒喝，也可作为传家宝传给下一代。这些陶瓷还可用来作为结婚时的聘礼，特别在苏巴农斯人和廷吉安斯人之中，求婚时，未来的女婿家必须拥有各种各样的陶瓷，因此双方经常因聘礼的数量与价值争论不休。^⑮

(三)

中华文化在菲律宾的传播远不止这些方面,还包括农业、印刷、雕刻艺术和建筑等方面。移居菲律宾的闽南人,有部分从事农田耕种,他们把蔬菜种植和水果栽培等技术引进到菲律宾,成功地种植出许多在菲律宾似乎是不能生长的西班牙和墨西哥蔬菜和水果。^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引进水牛犁田技术,当时的福建帆船在载运贸易品的同时,也把水牛载运到菲律宾作为犁田之用。据说在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之前,菲律宾人也有家养水牛,但不是用来犁田,而是作为一个人地位显赫的象征,当地的酋长通常拥有一头水牛作为骑乘之用,而不是犁田。故菲律宾史学家把这种技术的传入称作是闽南人“对菲律宾文化的一种技术贡献”^⑤。

在印刷术方面,一位名叫杨康(Keng Yong)的闽南人于1593年在马尼拉出版了第一本书籍《基督教义》(Doctrina Christiana),这比被誉为“菲律宾印刷宗匠”的首位著名菲律宾印刷匠托马斯·彬彬(Tomas Pinpin)早17年,比美国人出版的第一本书《赞美诗》(Bay Psalm)早47年。^⑥另一位教名叫胡安·德·维拉(Juan de Vera)的闽南人与神父桑·乔斯(Francisco Blancas de San Jose)合作,于1602年在菲律宾建立了第一个活版印刷厂,这架印刷机后来被转移到内湖的皮拉、巴丹的奥拉尼等地,最后被安置在圣·托马斯大学,至今还保存在那里。这架活版印刷机的使用比第一个英国移民在美国的使用早5年。^⑦

在雕刻艺术方面,早期菲律宾教堂里的一些偶像,如少年耶稣、圣母玛利亚、圣徒和使徒等,以及在奎松城圣多明各教堂的神圣玫瑰花,都是由闽南人雕刻,圣·托马斯大学艺术与科学博物馆馆长班塔格博士(Jose P. Bantug)曾鉴别说,从偶像具有中国人的鼻子和杏眼,则可察觉到是由中国艺人制作的。^⑧这些雕刻艺术渐渐为菲律宾艺术所吸收,在马尼拉的圣·奥古斯丁教堂就出现了中菲艺人合作的作品,在一幅高大的浮雕上,你可以看到一些圣徒被活埋和一些殉教者被杀的场面,这些人都是欧洲人,但作为背景的云彩却是中国的云彩。你还可以看到,有一些圣母或圣徒的雕像具有中国人的面孔,而穿着欧洲人的衣服,这就是福建雕刻文化与菲律宾艺术融合的结果。^⑨

在建筑方面,菲律宾现存的许多石头建筑,如教堂、修道院、桥梁、旧城墙和医院等等,都是出自闽南人工匠之手,富有中国建筑的特征。例如古老的埃斯帕纳(Fuente de Espana)石头大厦,有一个地方就刻有中国建筑者的名字。建造这些建筑所用的砖、瓦、石灰都是由华人亲手制作,据萨拉查主教说,华人利用菲律宾沿海找到的白珊瑚和牡蛎壳制造一种优质的石灰。菲律宾内湖的帕桑汉是1668年之前由闽南人移民建造起来的一座风景如画的城镇,这里最吸引旅游观光客的是帕桑汉入口处雄伟的拱道,在拱道的顶端有两只在打斗的中国石狮,似乎是在保卫这座城镇和使其华人祖先与华人纪念碑不受岁月和人为的袭击。每年来观看这座美丽城镇和举世闻名的帕桑汉瀑布的各地游客络绎不绝,他们将永远记住闽南人移民留给菲律宾人民的这些中国石狮。^⑩在苏禄群岛一些古老的清真寺,例如图比格·因当干(Tubig Indangan)、锡穆努尔岛(Simunul island)上的清真寺一些柱子的设计,明显都留下华人建造的痕迹,在邓贡(Dungon)、塔威塔威(Tawi Tawi)旧首府苏丹住宅,有的也是由闽南人建筑师建造。^⑪

综上所述,早期因贸易关系移居菲律宾的闽南人,多数是些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传播到菲律宾的中华文化主要是生活和经济方面,而较少涉及到文学和艺术方面。菲律宾史

学家阿利珀 (Eufronio M. Alip) 在《菲律宾政治文化史》一书中就写道:“遗憾的是,在与中国交往的巨大财富中,菲律宾对中国的哲学、文学和艺术懂得很少,原因是和我们接触的主要是厦门人,他们的主要兴趣是经济。”^⑩蔡德博士 (Gregorio F. Zaide) 在评论华人对早期菲律宾文化的贡献时也说道:“华人对古代菲律宾文化的影响,在本质上是经济多于知识或社会。”^⑪这种现象说明,中华文化在菲律宾的传播是闽南人长期移居菲律宾的结果。闽南人在移居的过程中,很自然地把家乡的风俗习惯、劳动技能带到菲律宾,通过自己坚韧不拔的辛勤劳动,为早期菲律宾的开发与繁荣作出了贡献。一位当时的目击者胡安·科博神父 (Father Juan Cobo) 曾公正地说过:“来这里贸易的是商人、海员、渔民,他们大多数是劳动者,如果这个岛上没有华人,马尼拉将很悲惨,因为华人为我们的利益工作,他们用石头为我们建造房子,他们勤劳、坚强,在我们之中建起了最高的楼房。”^⑫一些在西班牙统治的最初 200 年里访问过菲律宾的外国人,也证实了这种情况。1765 年,一位名叫利·金特尔 (Le Gentil) 的法国人评论说:“这些岛屿面临着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华人就不能生存。”另一位法国人马拉特 (Mallat) 亦说道:“许多人相信,华人对马尼拉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华人,马尼拉将一事无成。”^⑬

(本文作者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教授;责任编辑张秀明)

注释:

- ① 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志·泉州府晋江县澎湖屿》。
- ② Hon. Alejandro R. Roces For Closer Chinese-Filipino Cultural Relation, in Shubert S. C. Liao edited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Philippine Culture and Economy, Manila, Bookman Inc, 1964, p. 49.
- ③ H. Omley Beyer Early History of Philippine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Especially China, in E. Arsenio Manuel Chinese Elements in the Tagalog Language, Manila, Filipiniana Publications, 1948, p. x.
- ④ Eufronio M. Alip The Centuries of Philippine-Chinese Relations, Manila, Alip & Sons Inc, 1959, p. 94.
- ⑤ 见冯承钧:《诸蕃志校注》,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80-82 页。
- ⑥ 苏继顾:《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3 页。
- ⑦ Jim Haskin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 Grolier International, 1982, p. 25.
- ⑧ C. R. 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1953, p. 39.
- ⑨ ⑩ W. L.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1959, pp. 45-69-70-27.
- ⑪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Cleveland, 1903-1907, vol. III, p. 276.
- ⑫ Rafael Bernal The Chinese Colony in Manila 1570-1770, in Alfonso Felix, Jr. edited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66, vol. I, p. 46.
- ⑬ 徐学聚:《初报红毛番疏》,载《明经世文编》卷四三三,《徐中丞奏疏》。
- ⑭ 《闽书》卷一五〇,《岛夷志》。
- ⑮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VI, p. 65.
- ⑯ 李廷机:《报徐石楼》,载《明经世文编》卷四六〇,《李文节公文集》。
- ⑰ ⑱ The Manila Galleon, pp. 71-72-63.
- ⑲ 叶 :《吕宋纪略》,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帙。
- ⑳ The Chinese Colony in Manila, in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vol. I, p. 46.
- ㉑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三,《福建三·洋税》。
- ㉒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vol. I, p. 47.
- ㉓ ㉔ Edgar 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1850-1898,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22-38-172.
- ㉕ Jacques Amyot. S. J.: The Manila Chinese, the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1973, p. 151.

明代泉州人旅居东南亚的谱牒资料分析

郑山玉

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伴随着海外交通贸易的发生和发展,先民乘槎浮海出洋谋生,乃至移居海外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一般认为,泉州的海外移民(亦即华侨)肇始于唐至五代,而自宋以还,泉州华侨的出现则已日益成为普遍的现象。有关泉州人在海外活动的情况,历代文献虽有或多或少的记载,但显然是挂一漏万,远未能充分反映泉州华侨的全貌。而民间谱牒以其具体记录出洋族人的特有资料,则可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般史籍文献之不足。虽然由于年代久远,早期的谱书资料继承下来不多,特别是早年(明代以前)族人出洋的资料几乎无可寻觅;但至明代的出洋资料,尚可找到部分可谓珍贵的原始记录。本文即拟就所见的谱载出洋资料,对明代泉州华侨移居东南亚的情况,略作出分析探讨。

在我们经眼的泉州侨乡 200余部族谱中,有 16部族谱记载明代移居东南亚的华侨史料。其中出洋时间最早的是成化年间(或许更早),出洋地点主要集中在吕宋,以及爪哇、暹罗等地;大部分族谱仅有 1 2人或 3 5人出洋,个别谱也有 20几、30多人,统计出洋总数达 110人。当然,这些数字只是泉州谱牒中的一小部分,可能还有更多更珍贵的资料未曾发掘;而且,由于谱书体裁的局限,所记出

洋族人情况的文字也不多。但从总的说,我们仍可从中窥见明代中后期泉州华侨旅居东南

²⁸ Esteban A. de Ocampo Chinese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the Philippines, in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Philippine Culture and Economy, p. 90.

²⁷ T. R. McHale Early American-Philippine Trade The Journal of Nathaniel Bowditch in Manila, 1796, Yale University, 1962, p. 27.

²⁹ ²⁹ ³⁰ The Centuries of Philippine-Chinese Relations, pp. 28 99 101 105.

³¹ Robert B. Fox Chinese Pottery in the Philippines, in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Philippine Culture and Economy, pp. 105- 106.

³² ³³ Aurora Roxas-Lim Chinese Pottery As a Basis for the Study of Philippine Proto-History, i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vol. I , pp. 225- 226 231- 232.

³⁴ The Centuries of Philippine-Chinese Relations, p. 26.

³⁵ Fr. Horacio De La Costa Chinese Values in Philippin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arles J. McCarty edited Philippine-Chinese Profile, Manila, Unity for Progress, 1974, p. 52.

³⁶ Shubert S. C. Liao How the Chinese Lived in the Philippines from 1570 to 1898, in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Philippine Culture and Economy, p. 30.

³⁷ ³⁸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 pp. 174- 175 362.

³⁹ Chinese Values in Philippin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Philippine-Chinese Profile, p. 54.

⁴⁰ The Centuries of Philippine-Chinese Relations, pp. 104 106.

⁴¹ Cesar Adib Majul Chine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ultanate of Sulu, i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vol. I , p. 159.

⁴²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 p. 52.

⁴³ Gregorio F. Zaide Early Philippine History and Culture, Manila, Far Eastern University, 1937, p. 14.

⁴⁴ Father Juan Cobo's Account, i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p. 137.

⁴⁵ The Chinese Colony in Manila,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vol. I , p. 62.